

敦煌汉、藏文术数书整理释录与比较研究书系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 整理研究

陈于柱◎著

 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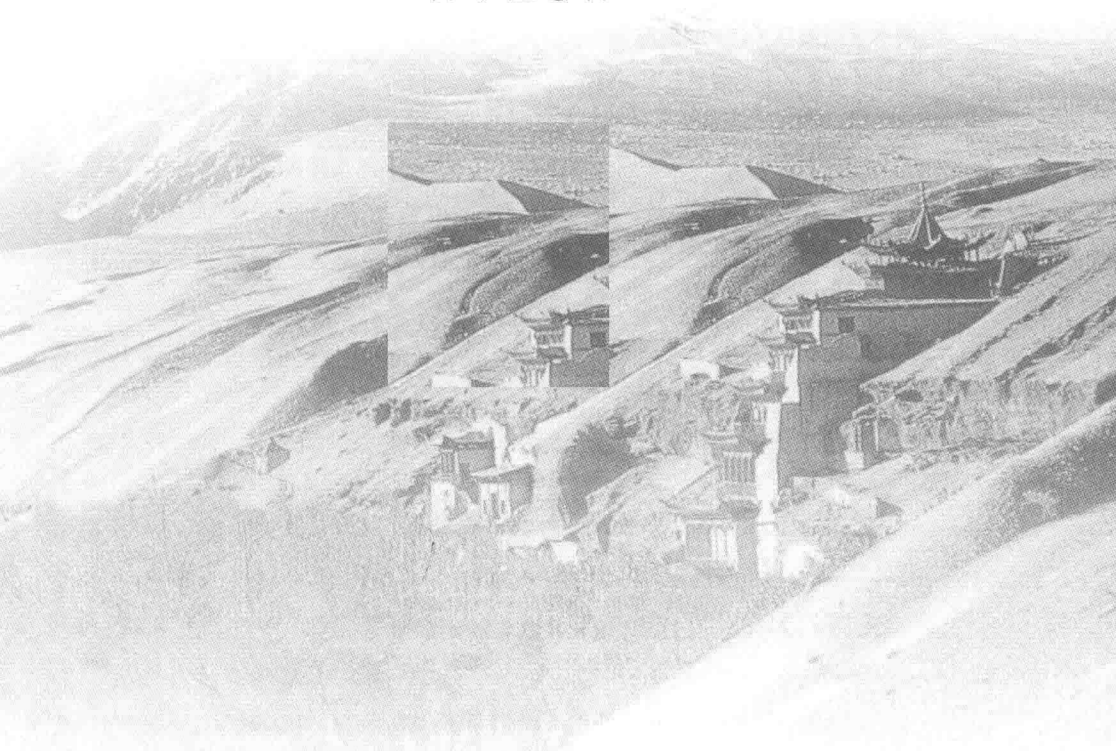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敦煌汉、藏文术数书整理释录与比较研究”（13YJA770007）资助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敦煌汉、藏文术数书整理释录与比较研究书系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 整理研究

陈于柱◎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发病书》为历代公私书目所未见，故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这批资料的发现，不仅为解决《发病书》在历史上的存在与流行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保存并丰富中古时代的文献典籍，而且可以补充学界对中古中国疾病史、医疗史、社会史等领域的进一步认识。

本书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的探究共设研究篇和校录篇两部分。在校录篇中，对目前所掌握的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于阗文占病文献、新发现的传世线装本《发病书》在内的全部资料进行校录整理，以方便学界参考和利用。在研究篇中，一方面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进行系统的写本文献学研究，进一步解决这批文献的定名、断代、缀合等问题；另一方面，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开展历史学探究，并就学界长期未能厘清的武威西夏墓葬部分彩绘木板画的性质与医史背景开展研究。本书不仅力求为学界提供经过整理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资料，而且希望通过历史学的介入，进一步扩展敦煌吐鲁番出土术数文献的研究范围，努力实现文献学、历史学、医学以及图像学的跨学科对话与协作。

本书可供中国史、敦煌学等学科学者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 / 陈于柱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0
(敦煌汉、藏文术数书整理释录与比较研究书系)

ISBN 978-7-03-050243-8

I. ①敦… II. ①陈… III. ①敦煌学—研究②迷信术数—研究 IV. ①K870.6 ②B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273 号

责任编辑: 陈 亮 范鹏伟 / 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联系电话: 010-6402 6975

E-mail: cheng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1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字数: 200 000

定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凡 例

1. S.: 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P.: 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编号。P.T.: 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伯希和编号。Дх.: 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Ф.: 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弗鲁格编号。Ch.: 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编号。I.O.: 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瓦雷·普散编号。Vol.: 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编号。

2. 凡一号中有多件文书者，以件为单位进行录校。在每件文书标题前标明其原编号。

3. 同一文书有两种以上写本者，释录到哪一号，即以该号中文书为底本，以其他写本为参校本。有传世本者，以写本为底本，以传世本为参校本。

4. 释文用阿拉伯数字标明行数。涉及图式，行数清晰者标之；否则不加以标明。夹行与图式中的文字，由于技术原因，个别字句可能与原文方位并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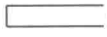

5. 底本与参校本内容有出入，凡底本中文字文义可通者，以底本为准，而将参校本中异文附于校记中。若底本有误，则保留原文，在错误文字下用（）注出正字。如底本有脱文，可据他本和上下文义补足，将所补之字置于〔〕内；无他本或据文义无法补足者，在校记中说明。对有疑义的字，原字后用（？）表示。原书写者未写完或未写全者，用“以下原缺文”表示。

6. 原件中的衍文，保留原状，但在校记中注明某字或某句衍。

7. 原件中的同音假借字照录，用（）在该字后注出本字。

8. 原件残缺，依残缺位置用（前缺）、（中缺）、（后缺）表示。对原卷辨



识不清或释读不出的字用□表示，一般每□表示缺一字。不能确知缺几个字的，表示上缺，表示下缺，中间所缺而不知字数者用表示，一般占三格，有时为保持原文格式，可适当延长，视具体情况而定。

9. 凡缺字可据别本或上下文义补足时，将所补之字置于□内。原文残损，据笔画和上下文可推知某字者，径补。

绪 论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是《敦煌汉、藏文术数书整理释录与比较研究》书系中的一部。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记载：“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①该则史料不仅表明“发病”是唐代社会较为流行的占卜事项之一，而且也清晰地展明了疾病对当时社会与民众生活的重要影响。然公私书目均未见载以“发病”或占卜疾病为名的著作。故 20 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区出土的《发病书》，无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批资料的发现，不仅为解决《发病书》在历史上的存在与流行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保存并丰富中古时代的文献典籍，而且可以补充学界对中古中国疾病史、医疗史、社会史等领域的进一步了解。可以说，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上讲为明确题作“发病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就广义而言，则是指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对年、月、日、时等各类时间段下得病者的病状、病因、治疗、禁忌、痊愈等情况进行占卜的文本。符合广义发病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笔者统计有 P.2856、S.6196V、S.6346V、羽 015 / 三 V、P.2978V、P.4732V、P.3402V、P.3556V、S.P.6、Dx.01258 + Dx.01258V + Dx.01259 (+ Dx.04253V) + Dx.01259V (+ Dx.04253) + Dx.01289 + Dx.01289V + Dx.02977 + Dx.02977V + Dx.06761 + Dx.06761V + Dx.03165V + Dx.03165 + Dx.03829 + Dx.03829V + Dx.03162 + Dx.03162V、S.1468、S.6216、Dx.05193、Dx.00506、Dx.05924、P.3081、P.T.55、Ch.468 (T II D 287)、Ch.1617 背 (T II T 3072)，其

^①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413 页。



中 P.T.55 为藏文写本，另有多件实为一卷之裂，或可以直接缀合。此外，和田出土的 Hedin17 号（A）于阙语文献在性质上亦属于《发病书》范畴，故此件写本也被纳入到本课题的研究范围。

学术界对敦煌《发病书》的研究，起步于 1937 年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对法藏 P.3081 写本的研究，他汇集诸家文字，对此件文书的内容、篇目及性质作了精审考辨^①，研究虽是题解式的，就卷中的《七曜日得病望》也未作专门讨论，但对“七曜”的域外特征给予揭示，为学界进一步探讨此件写卷提供了重要知识背景。1992 年日本出版的《讲座敦煌》第 5 卷所收菅原信海先生《占筮书》一文，首次对敦煌占卜文献加以汇集、分类，在引起人们对敦煌术数文献的关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 P.2856《发病书》的篇目构成等情况作了重点介绍^②。

进入 21 世纪，学界对敦煌《发病书》的关注呈现从以往个案式研究向整体把握的趋势。这一领域的全面研究，首推 2001 年出版的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该书对包括《发病书》在内的敦煌汉文术数文献开展了极为细致的调查、分类，逐一著录定名，并间加考证，发明极多，在敦煌文献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③。次年黄正建先生发表《关于〈俄藏敦煌文献〉第 11 至 17 册中占卜文书的缀合与定名等问题》一文，再次检出多件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发病书残卷^④。《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于 2014 年出版，该书进一步增收了新近刊布的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羽 015V《发病书》，并对此件写本进行了文献学探讨^⑤。

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ki）先生主持的“中古中国的占卜与社会”项目报告书于 2003 年由法国国家图书馆出版，该报告书不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发病书，而且还特别提及吐鲁番文书中存

① 王重民：《巴黎藏敦煌残卷叙录》第 2 辑，见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 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年，第 170 页。

② [日] 菅原信海：《占筮书》，载 [日] 池田温编：《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 年，第 458 页。

③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年，第 136—146 页。

④ 黄正建：《关于〈俄藏敦煌文献〉第 11 至 17 册中占卜文书的缀合与定名等问题》，《敦煌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48—49 页。

⑤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36—146 页。



有两件发病书残卷^①。马克先生的这一提示，对学界了解敦煌与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体情况而言，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值得表彰。

2013年出版的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一书，对敦煌遗书中的术数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分类与考订，就敦煌发病书而言，该书对相关残卷做了大量缀合工作，完善了学界对敦煌发病书的写本学认识^②，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道教史视角研究敦煌发病书，是21世纪初敦煌发病书研究的特色之一。王卡先生将S.6196V、S.6346V、S.6216、S.1468等多件敦煌写本发病书残卷定性为道教文献，并统一定名为《镇宅触犯治病日历》^③。刘永明先生通过对P.2856为中心的敦煌发病书内容构成、文本特点的分析，着重考察了敦煌本发病书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力图以此揭示道教世俗化的具体途径和表现^④。

据学者统计，新疆吐鲁番出土占卜类文献有40余件，内容涉及易占、卜法、禄命书及发病书等^⑤。荣新江先生最早著录了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残卷Ch.468(T II D 287)与Ch.1617背(T II T 3072)的文本情况，并通过与敦煌发病书的比较，对以上两件写本做了初步定名工作^⑥。马继兴先生从医药史视角考察了这批文献，认为Ch.1617背在性质上属于医方书，将其定名为《不知名药方第三十种》^⑦。

敦煌、新疆出土少数民族语言占病类文献亦已受到学界关注。敦煌古藏文P.T.55《十二因缘占卜》之《寿元品》系以十二因缘日为序占卜疾病的一件特殊写本，黄维忠、格桑央京两位学者相继释录、翻译了此件写卷，并做题解说明^⑧。此外，和田出土的于阗语文献中有一件编号Hedin17号(A)的写

① Marc Kalinowski, *Divination et sociétés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Etudes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 p.475.另需介绍和说明的是，王爰和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占卜文书研究》亦于2003年完成，该论文对多个类别的敦煌术数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与叙录。

② 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51—470页。

③ 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④ 刘永明：《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敦煌〈发病书〉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

⑤ 游自勇：《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90页。

⑥ 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135页。

⑦ 马继兴：《当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出土卷子本古医药文献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⑧ 黄维忠：《P.T.55号〈十二因缘生〉初探》，《贤者新宴》第2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11—215页；格桑央京：《敦煌藏文写卷P.T.55号译释》，《藏学研究》第9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48—271页。



本，贝利（H.W.Bailey）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于阗语文献集》卷四刊布了其释文，并拟题为《逐日身体不适推吉凶法》^①。近年刘文锁先生进一步分析了此件写本的文例特点和书写年代，并初步考察了其文本源流问题^②。古藏文和于阗文占病写本的发现与释读，对于学界了解占病类文献在中国古代敦煌与新疆少数民族社群中的传播与流行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自1937年以来的七十多年里，中外学者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文献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文献的刊布和叙录。随着各地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刊布工作暂时告一段落，除个别卷号外，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发病书资料多已被学界公布；二是敦煌发病书的写本学研究。由于敦煌写本发病书多为残卷，故对这些残卷进行初步的缀合、校理，成为学界过去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之一；三是敦煌发病书的宗教学研究。利用敦煌写本发病书探讨中古中国及敦煌地区道教史，是21世纪初学界对敦煌发病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在敦煌术数文献与道教关系的“准确对焦”问题上仍有待夯实，但既有成果扩展了敦煌发病书研究的视野。

不过，就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目前的整体研究状况而言，其形势并不令人满意，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首先，对敦煌遗书中的发病书资料及传世本发病书的拣择、搜集不够详尽和到位，且无完整的敦煌吐鲁番发病书辑校本。近年来各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多已刊布，学界对其中发病书的拣择和统计也不断完善，但时至今日仍有遗漏，以致既有成果对敦煌发病书资料掌握得不够全面。如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中的《推十干得病日法》保存了其他同类文献所未见的十余种致病鬼形，这样一件重要的发病书资料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此外，由于正史书目中未见著录有以占病为名的著作，故学界对《发病书》是否为一类专书以及敦煌藏经洞出土《发病书》残卷是否仅是流行于敦煌区域的一种地方性文献等诸多重大关键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而实际上在

① H.W.Bailey, *Khotanese Texts IV, Saka Text from Khotan in the Hedin Colle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09-110.

② 刘文锁：《于阗文占卜文书》，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9—320页。





距离敦煌《发病书》残卷一千多年的今天的中国某些地区，仍存在和使用《发病书》，只是学界此前未能开展有效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罢了。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资料的整理工作缺失尤甚，目前仍无一个完整的辑校本，而且已有的几篇录文存在不少错误。这些都不利于学界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全貌的了解和利用，也不利于新时期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整体推进。

其次，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的文献学研究仍有待持续深入。学界此前在敦煌吐鲁番发病书的文献学研究上尽管已投入很大精力，但仍存在缀合校理不完整、定名不准确、断代工作不深入等问题。如《俄藏敦煌文献》第八册曾刊布了由 Dx.01258、Dx.01259、Dx.01289、Dx.02977、Dx.03162、Dx.03165、Dx.03829 等七个编号组成的《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但由于《俄藏敦煌文献》与学界忽视了各书叶彼此的写本学关系以及卜辞文例的衔接性，故造成了目前相关书叶的排布仍是错乱的，需要重新校理。

再次，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缺乏综合整理与整合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敦煌本发病书者很少关注新疆地区出土的发病书资料，从而导致学界对《发病书》在古代中国流行传播情况的认识受到了极大限制。二是敦煌吐鲁番发病书资料中汉文与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比较综合研究深入不够，以致直接影响到某些学术领域关键问题的解决。

最后，学界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的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文献学与宗教史领域，较之以往虽已有拓展，但仍有许多重要领域未加注意，主要表现在发病书的历史学探究严重不足，学术价值未能充分挖掘等方面。《发病书》作为古代中国长期流行的实用书籍，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材料所反映的中古中国及敦煌吐鲁番等地区的疾病史、医疗史与社会史等问题前人普遍关注不足。

基于以上认识，为解决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本书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的探究共设研究篇和校录篇两部分。在校录篇中，对目前所掌握的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于阗文占病文献、新发现的传世线装本发病书在内的全部资料进行校录整理，以方便学界参考和利用。在研究篇中，一方面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进行系统的写本文献学研究，进一步解决这批文献的定名、断代、缀合等问题；另一方面，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开展历史学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

研究，重点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资料深入分析中古时代及敦煌社会的病因观念、医疗方法与禁忌、主要疾病与时疫、医者群体、医疗技术与族群对疾患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同时借助敦煌本发病书，对学界长期未能厘清的武威西夏墓葬部分彩绘木板画的性质与医史背景开展研究。本书不仅力求为学界提供经过整理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资料，而且希望通过历史学的介入，进一步扩展敦煌吐鲁番出土术数文献的研究范围，努力实现文献学、历史学、医学以及图像学的跨学科对话与协作。由于笔者学力有限，书中的不足势必在所难免，恳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目 录

凡 例	iii
绪 论	v

研 究 篇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叙录	3
敦煌写本发病书《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的再研究	22
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本《发病书》残卷整理与研究	27
敦煌写本 P.4732V+P.3402V 《发病书》缀合研究	32
再论敦煌写本《发病书》中的“代人”	38
敦煌术数文献所见“天医”考论	44
武威西夏二号墓彩绘木板画“蒿里老人”考论 ——兼论敦煌写本《发病书》中的“丈人”	49
医疗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吐鲁番《发病书》研究	62

校 录 篇

P.2856 《发病书》	91
S.6196V→S.6346V→羽 015V→P.2978V 《发病书一卷》	117
P.4732V+P.3402V 《发病书·推十干病法、推得病时法、推十二祇得病法、 推五行日得病法等（拟）》	128
Дx.00506+Дx.05924 《推得病日法（拟）》	135
P.3556V 《推十干》	138
S.P.6 《推十干得病日法》	140



Дx.01258+Дx.01258V+Дx.01259 (+Дx.04253V) +Дx.01259V (+Дx.04253) + Дx.01289+Дx.01289V+Дx.02977+Дx.02977V+Дx.06761+Дx.06761V+ Дx.03165V+Дx.03165+Дx.03829+Дx.03829V+Дx.03162+Дx.03162V 《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	144
S.1468 《推十二时中得病日等占法抄(拟)》	152
S.6216 《推初得病日鬼法等占法抄(拟)》	157
Дx.05193 《推得病日法》	161
P.3081 《七曜日得病望、推人八卦游载所至厄法等占法抄(拟)》	163
P.T.55 《十二因缘占卜·寿元品》(古藏文)	169
Ch.468 (T II D 287) 《推五子日病法、反支法等占法抄(拟)》	171
Ch.1617 背 (T II T 3072) 《发病书(拟)》	173
于阗文 Hedin17 号 (A) 《逐日身体不适推吉凶法》	175
《张天师发病书》	177

研究篇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叙录

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就广义而言，是指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对年、月、日、时等各类时间段下得病者的病状、病因、治疗、禁忌等情况进行占卜的文本。符合广义发病书概念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本书经过缀合校理之后，统计有十四件，主要包括：P.2856、S.6196V→S.6346V→羽 015 /三 V→P.2978V、P.4732V+P.3402V、Дx.00506+Дx.05924、P.3556V、S.P.6、Дx.01258+Дx.01258V+Дx.01259（+Дx.04253V）+Дx.01259V（+Дx.04253）+Дx.01289+Дx.01289V+Дx.02977 + Дx.02977V + Дx.06761 + Дx.06761V + Дx.03165V + Дx.03165 + Дx.03829+Дx.03829V+Дx.03162+Дx.03162V、S.1468、S.6216、Дx.05193、P.3081、P.T.55、Ch.468（T II D 287）、Ch.1617 背（T II T 3072），以上文献涵括了汉文、藏文两种语言形式。此外，和田出土的于阗文 Hedin17 号（A）《逐日身体不适推吉凶法》、笔者新近搜集到的线装本《张天师发病书》在本书中也一并加以介绍，以期进一步增进学界对中国古代发病书的整体了解。

一、P.2856《发病书》

此件首缺尾全，由多纸粘连而成，为敦煌本《发病书》各件写卷中最为完整者，尾题“咸通三年壬午岁五月写发病书记”。卷中各句起首部位常有朱笔点勘，存有：

（1）推人行年命算法（拟）。由年岁、男女之年立、各年龄的命算数、禁忌以及行年灾厄等事项构成；十六岁之前残缺，行文至七十八岁。如：“年五十八，男至癸亥，算，兵，土。女〔至〕乙亥，算尽，柱厄，溷。年五十九，男至甲子，算□□。女至甲戌，算始生，土。年六十，男立乙丑，算有二，溷。女立癸酉，算有二，土。”

（2）推年立法。以十二地支为序，对各行年中的禁忌、规避措施、疾病



状况、病因等情况加以占卜。如：“年立子，忌十一月五月，带此府（符）大吉。年立子黑色人衰，十一月口夜半时，五月午时，若其日时得病，十死一生，非其日时，不死。病者唯苦头痛，谈吐逆食不可下，胸胁疼痛，恍惚有时。祟在君、土公、丈人、司命、星死鬼，旦以大神食不净，病从南北因酒食中得，不死，子者，神后，天长女，主生人命，故知不死。病者忌五月十一月子午日。”每组占文之前附有所提之“符”。

（3）推得病日法。如“子日病者，不死者，神后，南斗之子，男轻女重，主生人命，故知不死。病者为人色黑，头痛，热，来去有时，脚沉重，五藏不通，心腹胀满，呕吐。祟在死鬼从外来，得之在舍，星死鬼、女子鬼。身疮盘，亦不产妇污秽。宅中有黄色男子从外东南来，惊动宅神。鬼字伯扶，亦名何伯，共害死鬼，去舍九十步。许怀神屋中。柏半火人遣送，辰日小差，午日大差，酉日忌。”其“日”以地支为序，占卜病者症状、病因病源、应对措施、康复周期等。与（2）“推年立法”不同的是，其应对措施使用的是代厄人形，而非符。

（4）卜初得病日鬼法。强调“卜男女初得病日鬼名是谁，若患状相当者，即作此鬼形，并书符厌之。并吞及着门户上，皆大吉。书符法，用朱沙闭气作之。”同样是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在各个“符”下，占卜各日得病者的吉凶，如“子日病者，鬼名天贼，四头一足而行，吐舌。使人四支不举，五脏不流，水肿大腹，半身不随（遂），令人暴死。以其形厌之，即吉。”看来，“卜初得病日鬼法”重点在于占卜致病鬼祟之“名”、“形”，以求“以其形厌之”。

（5）推得病时法。主要占卜十二时得病之情况，如“食时辰病者，从鬼（魁）病，何以言之，从魁住（主）人收病者不死。祟在丈人、庭中土公、使君，收鬼史（使）人魂魄欲送太山，未去。宜使良上师解，五日小降，七日大愈。”此则占法将病因归结于六壬十二神，这是不同于前者的地方。《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认为该占法以十二地支为序，不确，实是将“食时”等十二时与十二地支交互使用。

（6）推十二祇得病法。此则占法以十二建除为序占卜疾病。如“建日病者犯东方土公、丈人，索食，祀不了。有龙蛇为怪，家亲所为，解之大吉。七日差。”《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将“推十二祇得病法”之“祇”